

# 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指称物的运用及意义

张 碧

**摘 要:**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将英美符号学传统中指称物的概念运用于其符号学实践中,从而达到对由指称物所代表的社会现实领域进行认知和分析的目的,同时弥补了此前在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时存在的方法论缺陷。此外,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指称物的运用,客观上对英美、结构主义两种符号学传统的方法论进行了理论汇通,并突出了指称物在符号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为符号学理论建构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批评理论; 指称物; 英美符号学; 结构主义符号学

**作者简介:**张碧,西北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艺学、西方文学。电子邮箱:china\_zhangbi@163.com 本文系 2012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2XWW003] 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Application of Referent in Western Marxist Critical Theory and Its Significance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emiotic concept of referent in Western Marxist critical theory achieves the purpose of recognizing and analyzing the social reality represented by referents, and it has also made up for the blind areas in the methodology of structuralist semiotics. Furthermore, the application has theoretically bridged the two methodological tradition of Anglo-American and Structuralism semiotics, and it also highlights the referent a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study of semiotics, and therefore the application has made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o semiotics.

**Key words:** Western Marxism; critical theory; referent; Anglo-American semiotics; structuralism semiotics

**Author:** Zhang Bi, Ph. D., is a lecturer in the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00,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Western literature. Email: china\_zhangbi@163.com

作为符号学概念的“指称物”(referent)源自以皮尔士为鼻祖的英美符号学传统。自 20 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开始借鉴符号学方法以进行社会文化批评实践<sup>①</sup>,而指称物因其所指涉的现实领域成为诸多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至为关注的考察维度,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符号学批评中至为重要。本文拟从对“指称物”符号学意义的考察出发,以列斐伏尔和詹姆逊等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相关论著为例,对指称物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符号学实践中的建构作用及意义进行探讨。

## 一、“指称物”概念溯源

按照《韦氏词典》(*The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的

解释,“指称物”意为“象征(词或符号)所代表的东西”。随着近代西方人文学科的发展,这一概念逐渐获得诸多学科领域的关注。在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中,指称物在弗雷格、罗素、G. 摩尔、斯特劳森、维特根斯坦等人的指称理论建构中均极为重要。同时,对于与分析哲学存在学科谱系联系的英美符号学传统而言,对作为符号学概念的指称物的研究始终贯穿于其各个发展阶段,其代表人物皮尔士、奥格登、瑞恰兹、C. 莫里斯等人都为这一概念赋予过指涉范畴不尽相同、却又彼此相关的术语含义。

尽管最早出现于英国符号学家奥格登与瑞恰兹 1923 年所著的《意义的意义》一书,但被用作符号学术语的“指称物”实际是在皮尔士理论中的“对象”(object)<sup>②</sup>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众所周知,以逻辑学等学科为基

础的皮尔士符号学,开启了与欧陆索绪尔语言模式符号学分庭抗礼的英美符号学传统。作为这一传统的创立者,皮尔士建立了与语言模式符号学不尽相同的符号概念,亦即以其特有的意指三分法(tripartite semiosis)——将符号界定为由“再现体”(representamen)、“解释项”(interpretant)和“对象”(object)三部分构成(Peirce 228)。尽管皮尔士对这组概念的解释不甚确切,但有西方学者指出:与索绪尔所确立的由能指与所指两部分构成的符号概念相比,“再现体”大致相当于能指,亦即符号的感觉形式;而“解释项”大致等于所指,亦即符号的概念意义(Fiske 43)。较之索绪尔的“符号”概念,皮尔士意指三分法中所多出的“对象”指由再现体所代表的事物,亦即解释项在现实世界中的对应物。关于“对象”的存在属性,皮尔士曾通过所举实例,指出其指涉范畴包括解释项在物质和意识两个层面所对应的具体存在物:“考察对象在感知中对人类意识施加影响,且并不存在于意识之外;作为现实经验的对象,也指涉其他事物”(qtd. in Johansen 203)。换言之,对象作为解释项所意指的具体事物,既可以是属于客观世界的物理实存,也可以是人类观念领域的想象物。

奥格登、瑞恰兹两人受皮尔士符号学思想影响,为符号建立起“象征(symbol)—指称(refer-ence)—指称物”的三元模式,三个部分分别对应于皮尔士意指三分法中的再现体、解释项和对象(Fiske 42)。奥、瑞二人的“指称物”概念基本继承了皮尔士对“对象”的界定,只是所举实例更为具体:在两人看来,指称物在不同语境中分别指代“调适性生理反应的产物”(Ogden and Richards 53)、“事件”(event)(Ogden and Richards 62)、“虚假观念”(false belief)(Ogden and Richards 71)等,同时,指称物还具有被确切定位的物质属性(Ogden and Richards 106)。可见,奥格登与瑞恰兹对指称物的论述,不仅从存在属性角度扩展了皮尔士符号概念的意指范畴,而且使英美符号学对现实世界的符号学观照途径更为具体化。

不难看出,与皮尔士对“对象”存在属性的界定相似,奥、瑞同样将“指称物”的存在属性确定为同时属于客观实存和主观想象两种范畴,这种观念在此后莫里斯的理论中得到发展。莫里斯将指称物称为被指项(designatum),并从中划分出指涉想象世界中虚拟对象的虚拟项(denotatum)。同时,相对于此前皮尔士、奥格登与瑞恰兹将指称物视为对单个事物的指涉,莫里斯还从类属角度扩展了指称物的指涉范畴,提出指称物的指涉对象是“让阐释者经由符号载体(sign vehicle)的显现而虑及其属性的一种对象”,并指出“一个被指项并非指单个事物,而是指一类对象或一系列对象”(Morris 5)。显然,莫里斯从指称物的类属范畴角度对指称物进行了重新界定,使指称物摆脱了仅仅指涉单个事物的局限,从而极大地扩展了指称物的指涉范畴,为此后指称物被运用于社

会文化分析奠定了基础。

通过对上述几位英美符号学家关于指称物的论述的梳理,大致可以归纳出这一概念在英美符号学发展中的理论建构状况。值得注意的是,指称物虽备受符号学界关注,但其符号学意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却曾受到质疑,例如实证语义学派代表厄尔曼(S. Ullman)在批评奥格登和瑞恰兹的符号三元模式时指出:指称物往往用来指涉现实中不存在的虚拟物,其存在属性过于模糊(Petrilli 63-65),并提出符号学应对“意义的指称物理论”加以限定(Ullman 68-70);同时,翁贝托·艾柯(U. Eco)也曾一度以相同理由反对使用这一概念(Petrilli 63)。直到此后莫里斯等人对指称物的符号学意义进行充分阐述后,这种将其剔除出符号学研究的主张才日渐式微。尽管如此,指称物这一概念在相当长时间内仍未获得学界足够重视,尤其是在注重共时分析、轻视历时考察的欧陆索绪尔符号学传统中,更是难以找到与指称物含义相近的概念。指称物似乎成为西方主流符号学界中一个被边缘化的领域。

然而,从七十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指称物的应用,使得这一概念开始频繁出现于符号学视域中。

## 二、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 对指称物的发掘与重视

从20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日渐受到结构主义思潮影响,其最为明显的表现便是符号学将结构主义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发展出与结构主义研究领域几乎重合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甚至有学者提出“符号学范畴(如果它有)与结构主义大致上彼此相接:两个领域的旨趣并无本质区别”(Hawkes 101),并将这一符号学支系视为整个符号学的代名词。与此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0世纪中叶基本完成“文化转向”,且基本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兴起时间一致,因此从六十年代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开始自觉地将以结构主义支系为主的符号学方法运用于社会文化批判之中。然而,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从一开始便意识到结构主义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存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本质差异。具体而言,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颇为复杂而矛盾,但许多批评家还是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以辩证眼光来衡量客观社会结构变革的方法态度,例如阿尔都塞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于对现实(concrete)情形的实际分析”(Althusser 30)。同时,结构主义符号学主张以共时性静态视角来考察对象,从而忽视了符号所意指的社会性、历史性的具体因素。两股思潮在共时/历时、动态/静态的考察维度的选择上,亦即在考察社会文化现象时,应以社会现实还是理论抽象模式作为考察对象的问题上,产生

了难以弥合的分歧。<sup>③</sup>

皮尔士将“对象”及奥格登和瑞恰兹等人将“指称物”纳入对符号学的基本建构,标志着现代符号学理论对现实世界的基本观照,也在很大程度上对索绪尔所抛弃的符号历时性、现实性因素进行了补充。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从六十年代开始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时,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符号学支系忽视社会现实维度所带来的缺陷。因此大约自20世纪七十年代始,当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发现英美符号学具有结构主义符号学所不具备的社会现实观照功能时,便自然而然地将英美符号学理论应用于其社会文化批评之中,而这种应用的重要表现之一,便是对“客观现实”意义上的指称物的借用。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指称物的借用主要源于英美符号学传统,而非英美分析哲学,原因在于:首先,在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相关著作中,英美分析哲学的影响痕迹十分有限,詹姆逊便曾提出“英美思想——经验主义、日常语言哲学、维特根斯坦,诸如此类——对我来说多多少少是一种阻碍”,同时,又承认“自皮尔士以来在英美传统中有极为有趣的东西”(詹姆逊6);其次,分析哲学虽将指称物视为意指化过程的重要构成因素,却否定了指称物在文学及文化领域的意义,“分析哲学与索绪尔语言学的共同特点都是否认文学语言与指称物或现实的关系”(汪正龙27),这种特质必然限制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从分析哲学中对指称物的援引;再次,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往往将英美符号学与索绪尔传统符号学相提并论,并将“指称物”与结构主义传统的“能指”、“所指”等符号概念并用,因此以英美符号学观念来修正和补充结构主义符号学的针对倾向十分明显。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对指称物的借鉴应当主要源于英美符号学,而非分析哲学。

英国文化社会学家斯图亚特·霍尔在相当长时间内曾以“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者”(McRobbie 10)身份活跃于文化研究界;同时,在其早年一系列社会文化批评实践——例如对时事节目权力结构的分析中,都带有明显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痕迹。然而,结构主义符号学在社会文化批评中所暴露出的封闭性缺陷,令霍尔逐渐意识到这一符号学支系已使文化研究学科陷入方法论的窘境。<sup>④</sup>

霍尔认为,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致命缺陷,在于未能认识到符号学的分析对象实际存在于社会现实中:“索绪尔几乎只关注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却很少甚至根本不注意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如何有助于我们此前所说的指称的目的——亦即存在于语言之外‘现实’世界之内的事物、人和事件”(Hall 34)。同时,霍尔也注意到皮尔士符号学中的指称物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语言学家恰尔斯·桑德斯·皮尔士虽使用了与索绪尔类似的方法,却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和被他称为指称物的概念上”(Hall 34)。从霍尔此处所举的“书”

的例子来看,他所说的指涉客观世界中具体事物的“指称的目的”(purpose of reference)指的正是奥格登和瑞恰兹的“指称物”,只不过他误将这一术语的提出者当成了皮尔士。霍尔显然注意到,结构主义符号学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实践中所暴露出的方法论缺陷,能够以英美传统符号学的“指称物”加以弥补。

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社会学家阿尔伯特·柏格森(A. Bergesen)从指称物角度对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社会观进行批评。柏格森首先指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与索绪尔的“语言”/“言语”二元范畴,具有明显的异质同构性: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犹如索绪尔的“语言”,能够通过“传唤”手段,使诸多社会个体如能指在系统内获得固定的所指一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所应扮演的具体角色(Bergesen 6-9)。在柏格森看来,阿尔都塞对社会结构所做的这种结构主义式阐释,将社会的发展归因于作为意识形态的“结构”作用,在本质上是静态眼光来看待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问题,因此与马克思主义辩证观迥然相异。

在柏格森看来,结构主义符号学这种忽视作为社会现实的指称物的方法模式,在语言学领域也许无可厚非;但当该模式被阿尔都塞隐喻式地运用于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时,其忽视指称物作用的特质,便使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的共时性缺陷暴露无遗:“忽视外部指称物对社会地位和阶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是十分错误的,因为这使社会脱离了其外部世界的物质属性”(Bergesen 10),其方法模式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截然相悖。

因此,如果要调和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结构主义符号学,使两者间不致发生认识论冲突,便必须引入“指称物”概念,将被遮蔽的社会现实维度纳入观照视野。反之,“如果忽视外在指称物的作用,那么包括生产力的变化在内的诸多现实条件,作为影响社会结构的诸多因素,同样会被忽视”(Bergesen 10)。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在运用符号学进行社会文化批评的过程中,对指称物的运用,并非单纯的符号学术语援引,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将被结构主义符号学所忽略的、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为珍视的社会现实因素纳入了符号学考察视野。

### 三、列斐伏尔与詹姆逊对指称物的运用

如果说霍尔和柏格森只是单纯强调了指称物在对社会现实的符号学分析过程中应有的作用,那么在列斐伏尔及詹姆逊两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著作中,指称物概念则不仅得到了细致的分析,还被直接运用到对具体社会文化的符号学分析之中。

自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逐渐产生变化,其重要特征之一表现为

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体系与社会生产结构间关系的复杂化。马克·波斯特指出,在全新的社会生产条件下,以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为基本考察对象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已很难对日益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体系进行有效分析(Poster 68-70)。在这种情况下,业已完成文化转向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必须借助符号学知识,才能有效解译渗透于文化意识形态中的符码含义,并揭示新的生产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特质。其中,列斐伏尔、詹姆逊等正是运用符号学方法进行社会文化剖析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代表。

列斐伏尔曾明确表达对福柯、巴尔特及拉康等人结构主义方法的反感,尤其在批评结构主义之代表列维-斯特劳斯的论述中,列斐伏尔对其将结构主义符号学用作社会文化分析方法时存在的缺陷更是大加抨击。<sup>⑤</sup>尽管如此,列斐伏尔仍批判性地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某些概念和方法运用于对现代社会文化的剖析当中。

如前所述,当结构主义符号学被隐喻式地运用于社会文化分析时,其轻视表意化过程的共时性方法特质,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一般社会学都最为重视的社会现实维度被抛弃,而只能通过列维-斯特劳斯的语言学理论模型途径,对社会进行抽象的形式化分析(Levi-Strauss 279-80)。列斐伏尔意识到了当结构主义符号学被应用于社会文化分析时所具有的缺陷:在其符号系统论中,能指与所指的组合——亦即符号意义的形成,必须以系统内彼此间所具有的差异性为前提,而不是直接源于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因此符号意义的形成在本质上具有明显形式化的、形而上学的特征,也便不适用于对社会现实进行分析。列斐伏尔由此提出:“问题不应再被局限于语言或超语言范畴,因此我们必须抛弃语言学方法,并认识到作为社会现象的指称物在社会学中的作用”(Lefebvre 111),并对作为符号学重要维度的“指称物”展开了讨论。

列斐伏尔指出,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的致命缺陷,在于忽视了对符号与表意对象之间关系确立机制,亦即对表意化过程的阐述。“‘椅子’一词意指‘椅子’这样一个概念;然而‘椅子’的对象(object)是否确实存在的问题却被置之度外”(110),结构主义符号学对表意化过程的忽视,使符号无法与具体指涉对象之间建立联系,“如果脱离法国社会,脱离时间和空间的诸多具体存在(specifications)我们便无法确定或定义任何事物,例如‘椅子’的对象、现实的‘路’及法国的语言”(111)。那么,如果要确定单词“椅子”、“路”在现实生活中的所指涉的哪把具体椅子、哪条具体的路,便必须以特定时空场域中的具体实存来限定这一词汇,也就是将此词汇符号置于具体的现实性语境之中去考察,并确定其指称物。列斐伏尔认为,只有通过指称物才能在符号与现实世界间建立联系,才能真正使符号学在社会文化批判中的重要性得到体现,并由此将指称物这种能够确定符号指涉对象

的功能称为“指称物功能”(referential function)。

在对指称物重要性的认识基础上,列斐伏尔将这一概念运用于对社会文化的符号学批评之中。列斐伏尔提出,符号意义的形成,亦即能指和所指关系的确立,必然建立在人们对具体指称物的认识基础上。但他觉察到:就社会语言符号而言,其符号表意机制建立在“可靠且彼此连贯的指称物基础上”(111)的状况,仅仅停留于19世纪中叶;此后,随着现代科技对人类社会诸多领域影响的剧增,日新月异的社会形态变化使人类认识世界的眼光产生质变,尤其是电讯工业的蓬勃发展,使人类的世界认知方式逐渐脱离对真实可感的客观事物进行观察这一基础,并从视觉上营造出符号化的社会景观,从而使社会现实被这种景观遮蔽。列斐伏尔对这种社会文化现象有着清晰的认识:“欧几里德和牛顿意义上的绝对时空不复存在,可感知的现实失去了它稳固的指称物”(113),人类对社会的认知不再建基于对物质现实的感性直观和概念归纳,而是直接建立在对由符号体系所构建的虚拟世界的基础上。“客体(objects)在现实中变成符号,而符号却变成客体,‘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取代了此前的‘自然’状态,亦即取代了感知性的真实性这一首要维度”(113)。值得注意的是,列斐伏尔对这种社会文化现象的描述在其弟子波德里亚的“拟像论”中同样获得深入探讨:“整个系统如今都被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所遮蔽,一切真实性都被符码与拟像的超真实性(hyperreality)所吞并”(Baudrillard 2)。两人都觉察到:在全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及社会状况下,包括语言在内的诸多社会符号系统,都失去了以社会现实为指称物的历史基础和准则,而只剩下能指与所指的随意组合,这种状况在1910年的西方艺术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音乐家们在作曲前,首先确定作品的情感基调,然后才为这一情感所指“寻找能指”;而在绘画界,不同绘画流派则基于对画作“所指主题”与“能指形式”间关系的不同理解,或根据所指主题为绘画创造能指形式,或先创造能指形式,再为其赋予所指主题,进行着截然不同的艺术实践(113-14)。可见,社会指称物从人类认知视野内的消失,使人类文化的符号表意体系及文化生产体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剧变。

列斐伏尔通过将指称物引入其符号学实践,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符号虚拟性特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从而为其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文化革命”构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206)。

在结构主义符号学中,“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亦即符号意义的产生,必须以形而上学式共时系统中的差异性对立关系为基本条件,而英美符号学却强调符号中指称物的客观属性及其经验主义式的感知方式。显然,能指/所指与指称物分别属于不同的认识论体系。因此,当两种分属于不同认识论体系的符号学概念被同时应用时,必须解决的是如何在形而上学的和经验主义的方法

间建立关联,亦即如何调和符号学共时性与历时性两种方法维度的问题。列斐伏尔通过指出指称物确定符号现实属性的“指称物功能”,使其能够为能指、所指的结合提供具体社会现实语境,为本处于抽象符号系统的能指、所指赋予意指客观现实的功能,从而将共时性和历时性两种考察维度联系起来。这种方式,也使得列斐伏尔的符号学方法具备了某种后结构主义色彩。

在将符号学方法运用于文化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里,对结构主义自身的形而上学方法维度进行过最为全面而透彻剖析的当属詹姆逊。同时,詹姆逊还对结构主义符号学与英美符号学进行了深入比较。如前所述,能指/所指与指称物两组符号学概念分属于不同的认识论体系,关于当两者同时被应用于社会文化分析时如何在两者间建立关联的问题,詹姆逊做出了有别于列斐伏尔的阐释。

首先,詹姆逊意识到指称物的重要性,“一个符号、词汇或文本,在这里都被模型化(modelled)为能指(即物质的客体、词汇的发音及文本的原本)和所指(即物质性词汇或文本的意义)间的关系。第三个因素是所谓‘指称物’,也就是由符号指涉的‘真实’世界的‘真实’客体”(Jameson “Postmodernism” 118-19)。同时,他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不应忽视指称物这一重要认识维度:“索绪尔在其语言体系中认为它(指称物)对科学语言学无足轻重,因而始终把它置于一旁或极不显眼的位置”(詹姆逊 283),“结构主义一般认为,对指称的感知只是一种趋向于神话的东西,人们不再能够通过外部或客观途径来谈论‘真实’,以致只剩下符号自身及其两个构成因素”(“Post-modernism” 119)。詹姆逊显然认为,忽视指称物及符号表意化过程,是结构主义符号学陷入共时性方法论窠臼的重要原因。

其次,詹姆逊也意识到英美符号学的经验主义传统使其符号学的认识功能受到极大限制:“英美经验主义的缺陷表现在固执地将考察对象与其他对象彼此分离——无论它是物质的东西、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事件’,还是一个词汇、一个句子、一个‘意义’”(Jameson “The Prison” 23)。经验主义使符号表意被局限于主体相对独立的感性活动中,而无法对作为整体的现象范畴进行充分认识和阐释,从而走向了与结构主义符号学缺陷相反的另一极端。正如詹姆逊所觉察到的,奥、瑞符号学所采取的经验主义方法尽管使其避免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共时性思维,却使符号学的考察对象被彼此隔绝,而无法从整体上去认识对象,也就使其无法如结构主义符号学那样被有效地运用于对社会和历史整体的分析与探讨,“在我们尝试决定指称物的意义时,相同的本体论解散现象(ontological dispersal)、相同的离散而经验式的破碎会被人所感知”,这种状况也使符号学家“在承认指称物的作用时却将其束之高阁”(“The Prison” 211),从而在符

号学被应用于社会文化分析时,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所着重考察的一系列社会因素无法得到有效的审视与分析。

在此基础上,詹姆逊对两种符号学体系的表意功能及认知方式进行调和。在他看来,“整个符号系统、整个语言(langue)领域与现实自身平起平坐;换言之,语言体系的整体与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所有被组织化的结构彼此类似,我们对对象的理解是从一个整体或完形(Gestalt)到另一个整体或完形来完成的,而决非在一一对应的基础上”(“The Prison” 33)。詹姆逊援引完形心理学理论,指出作为指称物的现实环境能够在形式上产生与主体意识领域相应的构型,换言之,现实环境总是作为整体被纳入意识领域内。同时,意识领域通过系统化的语言符号,对被内化为心象的现实环境进行分门别类的概念化活动,完成符号分节(articulation)过程,使得语言体系能够从整体上意指现实世界。这样,詹姆逊便在理论上实现了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系统论和英美符号学的经验主义的调和,使符号学在发挥社会文化分析功能时,得以同时兼顾对社会的抽象整体和客观现实双重层面的观照。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詹姆逊将英美符号学的三分法式符号概念运用于其社会文化的符号学实践中。有趣的是,对于符号的各构成因素,詹姆逊并未采取奥格登、瑞恰兹的“象征—指称—指称物”的表述方式,而是比列斐伏尔更为直接地以“能指”、“所指”和“指称物”组合成新的符号概念。这种全新的符号组合方式,并不仅仅意味着符号概念表述方式的变化,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意味着詹姆逊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系统论特质与英美符号学的经验主义特质结合起来的尝试。

詹姆逊运用所创立的新符号概念,通过能指/所指和指称物间关系的裂变维度来审视社会文化状况,与列斐伏尔的符号学实践极为相似。这种实践集中体现为詹姆逊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特质所进行的历史性维度的分析(詹姆逊 279-82),他从德勒兹、伽塔利和曼德尔的著作中获得灵感,将西方国家的历史社会形态划分为“前资本主义时期”、“市场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和“跨国资本主义时期”三个阶段。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生产方式所引起的社会文化符号化、体系化的特征的认识(“The Prison” ix),詹姆逊从符号学角度对三个阶段所分别对应的文学形态——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质进行了分析及归纳:在现实主义文学中,语言的能指/所指准确地反映外在的指称物世界;现代主义文学语言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物化(reification)作用下,能指/所指脱离指称物基础,独立地构造虚拟的文学世界;对后现代主义文学语言而言,能指与所指彼此分裂,能指随语境的变化而获得不同的所指意义(詹姆逊 282-86)。

此外,詹姆还通过对录像文本的观察,对资本主义内部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形态完成了进一步的符号学分

析 其中 对社会指称物的考察依旧是其符号学分析的重要维度 (Jameson "Reading" 219 - 23)。由此 詹姆逊以其特有的符号学理论 对西方社会 尤其是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文化特质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辨析 从而在历时性层面阐述了其观点独到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

## 结 语

通过对霍尔、柏格森、列斐伏尔及詹姆逊等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相关著作的分析 不难看出指称物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符号学实践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如前所述 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将指称物概念纳入自身的批评体系 绝不仅是简单的术语援引 而是具有多层重要意义:

首先 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刚完成“文化转向”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在借助索绪尔结构主义符号学进行文化批评实践时 意识到结构主义符号学重共时性分析、轻历时性表意实践的方法特性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法存在严重分歧。在这种情况下 对指称物的运用 使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得以有效达到对社会现实进行观照与分析的目的 从而弥补了此前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时所产生的方法缺陷。

其次 作为西方两大符号学传统 索绪尔结构主义符号学与英美符号学在哲学谱系渊源、方法论基础及符号实践的侧重维度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指称物的分析与运用 是以两大符号学传统各自的方法优势对对方的缺陷进行弥补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两者进行了理论汇通。

再次 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指称物的分析与运用 使指称物这一一度受到符号学界忽视的重要概念 重新获得符号学界的重视 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也由此在符号学理论建构方面做出了特有的贡献。

综上所述 对指称物的运用 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及社会语境中所具有的与时俱进的时代性特征;同时 通过指称物概念对两大符号学传统进行理论汇通的工作 也令人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在人文科学知识领域内无可辩驳的元语言地位叹服不已。当然 指称物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内的建构 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符号学知识进行社会批评实践的冰山一角 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中符号学因素的发掘和探求 仍有漫长而曲折的研究之路要走。

### 注释 [Notes]

①③④ 分别参见张碧:“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符号学的批判与借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42.2(2013):35、36、38。

② Object 在英文中兼有“对象”和“客体”两层互相关联

的含义 本文根据具体语境对该词采取不同译法。

⑤ 参见 Kurzweil, Edith. *The Age of Structuralism: From Lévi-Strauss to Foucault*. New Brunswick and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6. 57 - 86; Lefebvre, Henri. *L'idéologie structuraliste*. Le Droit à la ville: Éditions Anthropos, 1971. 66 - 110.

###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 Althusser, Louis. *The Humanist Controversy and Other Writings (1966 - 67)*. Ed. Francois Maheron. Trans. G. M. Goshagaria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3.
- Baudrillard, Jean.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Trans. Iain Hamilton Grant.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3.
- Bergesen, Albert. "The Rise of Semiotic Marxism."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6.1 (1993):1 - 22.
- Fiske, John.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Seco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 Hall, Stuart. "The Work of Representation."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Ed. Stuart Hall.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7. 13 - 74.
- Hawkes, Terence. *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 (Seco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Jameson, Fredric. "Reading Without Interpretation: Postmodernism and the Video-text." *The Linguistics of Writing*. Eds. N. Fabb, D. Attridge, A. Durant and C. MacCab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7. 199 - 223.
- - -. "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 *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Ed. Hal Foster, Washington: Bay Press, 1983. 111 - 25.
- - -.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 A Critical Account of Structuralism and Russian Form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 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7 年。
- [Jameson, Fredric.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Trans. Zhang Xudong, et al.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 Johansen, Jorgen Dines. *Dialogic Semiosis: An Essay on Signs and Meaning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Lefebvre, Henri.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ans. Sacha Rabinovitch.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4.

- Lévi-Strauss, Claude.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Trans. Claire Jacobson and Brooke Grundfest.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63.
- McRobbie, Angela. *The Uses of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5.
- Morris, Charles W. .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 Chicago and Illino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8.
- Ogden, C. K. , and I. A. Richar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upon Thought and of the Science of Symbolism*.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23.
- Peirce, Charles S. . *Collected Papers*. Vol. 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 Petrilli, Susan. *Sign Crossroads in Global Perspective: Semiotics and Responsibility*. Ed. John Deely.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0.
- Poster, Mark. "Critical Theory and Technoculture: Habermas and Baudrillard." *Baudrillard: A Critical Reader*. Ed. Douglas Kellner. 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 Ltd, 1994. 68 - 88.
- Ullman, Stephan.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 New York: Barnes & Noble Inc. , 1962.
- 汪正龙 "论文学的指称——超越分析哲学视野的文学表意路径考察", 《文学评论》3(2011):26 - 31。
- [Wang, Zhenglong. "On Reference of Literature: Beyond the Literary Signification in the Approach of Analytic Philosophy." *Literary Review* 3(2011):26 - 31.]

(责任编辑:王嘉军)

(上接第 135 页)

- 陆士谔《新上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Lu, Shi'e. *New Shangha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7.]
- 旅生《痴人说梦记》,《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第15册。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
- [Lv, Sheng. *Tales Told by an Idiot. Chinese Modern Rare Fictions*. Vol. 15. Shenyang: Chunfe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7.]
- 遽园《负曝闲谈》,《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第17册。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
- [Qu, Yuan. *Casual Talks When Basking. Chinese Modern Rare Fictions*. Vol. 17. Shenyang: Chunfe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7.]
- 孙逊 "海派文化: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先行者",《江西社会科学》5(2010):7 - 13。
- [Sun, Xun. "Shanghai-Style Culture: The Forerunner of Urban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5 (2010): 7 - 13.]
- 孙逊 刘方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及现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5(2007):160 - 70。
- [Sun, Xun, and Liu Fang. "Urban Writing in 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and Their Modern Interpretatio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5 (2007):160 - 70.]
- 王韬《瀛壖杂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Wang, Tao. *The Bund Magazine*.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9.]
- 袁行霈 陈进玉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上海卷》。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 [Yuan, Xingpei, and Chen Jinyu, eds. *A General Survey of China's Regional Culture: Shanghai Volum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3.]

(责任编辑:程华平)